

# 前 言

撰写本书的动力来自 1991 年 9 月在牛津大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的谈话。我谈到国际金融界未来的事态发展，有人问我，是否能推荐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好的书籍。我无法办到……于是，我想到，我得试试写出这样一本书来。

我所写的不同于未来学中的大多数习题。这些习题采取提供各种方案的形式，概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让读者从中加以选择，或者描述一幅夸大的乐观主义或者夸大的悲观主义的图景。第一种办法对于企业是有用的，用来作为概述它们可能安排计划的各种可能性的一种方式，率先采用这种办法的壳牌石油公司以及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这方面作出了出色的工作。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于 1991 年夏天就世界经济的长期前景举行了一次会议，我感谢该组织帮了我很大的忙。但是，提供方案的做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有些方案可能比较正确，或者不大正确，而另一些则是明显错误的。第二种办法同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作者们倾向于对未来有一种顽固地坚持己见的看法，使读者不得不予以接受：未来要么妙不可言，要么糟糕透顶，而且堆砌了种种证据来支持一种看法。我能识别这种风格，过去我本人也对此作出过贡献。

我设法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先是看一看目前存在的这个世

界，然后探讨一下谋求变革的各种力量，并设法来判断，在下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些力量将如何来改变世界，最后把注意力放在特别是工业化国家需要采取的某些选择上。我知道，这本书有其自身的弱点，那就是许多细节结果证明是错的，不过，我更为担心的是，由于分析时的某些缺陷而使我未能发现某些真正巨大的全球性变化。

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目前的发达国家以及在今后 30 年内很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的那些国家。世界分成北美、欧洲和东亚三个主要经济区，这意味着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印度次大陆，人们只是一略而过。对于我所描述的 2020 年的情况，这不算什么严重的疏忽。从人类、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地区自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这些地区作为经济生产者，不是特别重要（中东的油田是特殊的例外），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些地区也不会变得特别重要。即便印度这个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在今后 30 年中取得了比它在过去 30 年中为好的经济成就，到 2020 年时，它也不大可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经济大强国。对比之下，中国大概会成为这么一个世界性经济大强国，虽说中国的进步或许会证明比许多人 1994 年时设想的要来得更为不平坦。

任何一个人想就世界未来的发展这样广泛的题目撰写一本书，都会知道，你所能做的只是在他人思想的巅峰垒起一小堆石头。我了解这些思想中的某些思想以及提出这些思想的人，但是，我也知道，在我 20 年来在英国两家全国性报纸上解释和撰写世界经济的变化过程中吸收和发展了另一些思想，而最初并未意识到这些思想为我所瞩目。结果是，我无法感谢任何人帮助我写了这本书，而且无法说清楚，为什么我得出了自己的那些结论。我设法在有关材料来源的注解中尽可能地解释清楚，每一章是如何写成的，是主要依据对专家的采访，还是主要凭借公开发

表的材料。

为《独立报》撰稿已证明是一个扎实的基地，可从那里出发进行我的未来之旅。我不仅能够通过我的专栏向市场测试一下若干想法，而且我周围有一批人富有创见，精力旺盛，我可以测试他们的意见，当他们认为我的看法错了时，很快就告诉我，其中有几位的想法写进了本书；玛丽·德耶夫斯基在俄国发生的变化问题上是一位贤明的顾问，就如蒂姆·杰克逊在日本问题上是这样一位顾问一样；戴维·罗布森和简·泰勒则一再问道：“想法很有意思，不过，这个想法是否对头？”；马修·西蒙兹就经济学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想法；编辑安德烈亚斯·惠塔姆·史密斯在整个撰写过程中一直鼓励我。

还有一批人跟这本书直接有关。在哈珀·柯林斯出版社，迈克尔·费希威克一直是一位模范发行人，满怀热情，时而给予支持，时而提出意见，而朱丽叶·范奥斯精心熟练地编辑了手稿。安德罗·埃文斯设计了封面，菲利普·刘易斯设计了全书。《独立报》的贾斯廷·阿伦德尔和帕特里克·坎宁安看了校样，克里斯廷·伯恩斯坦编写了索引。安妮·哈撒韦也帮了我的忙，她充当了研究人员、鼓舞者、查核者和编辑，常常找到一些我希望存在，但却又无法发现的事实和数字。我的妻子弗朗西丝·凯恩克罗斯也帮了我的忙，她阅读并编辑了整个草稿。除了我出了一些令人难堪的大笑话之外，她还使得我的许多想法变得更合乎逻辑。为此，也为了其他许多事情，我总是感谢不尽。

哈米什·麦克雷

1994年2月于伦敦



## 第一部分

# 世界目前的状况



## 第一章

# 是什么使各国求得发展

### 有效的社会

任何国家今后 30 年的成功或者失败取决于增长。到下一代人的时候，有的国家大概会大大改善生活水准，大大提高生活质量；有的国家将会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会变得稍微富一些，但是会感到苦恼，因为它们的经济相对地在下滑；还有一些国家则注定要失败，会面临种种痛苦，使它们的人民的生活水准下降。

要对哪些国家将会兴旺，哪些国家将会失败，作出一个切合实际的判断，必须能说清楚目前和不久前的过去的状况：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超过别的国家，不光是在改善生活水准方面，而且也在增强实力和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方面。这牵涉到探讨这些国家从现在起的竞争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这些国家制造业的力量和弱点之间相互关联的一个变数。这还牵涉到对这些国家的服务业（银行、旅馆、保健、教育等等）的效率作出某些判断：这些行业目前有多大竞争力，到下一代人的时候，它们的相对竞争力又会如何发生变化。在所有这一切中最重要的是，这还牵涉到对这些国家的整个社会的效率作出判断，特别是对北美、

欧洲和东亚对社会组织采取的显然不同的态度作出评估。<sup>①</sup>

最好是通过三个尺度的考察来对这三个地区组织各国社会的方式加以比较：国内生产总值<sup>②</sup>在有关国家所占的比例，这使人对于国家对社会事务所承担的责任的程度有一种看法；储蓄的水平，这使人对于可以得到的投资资金有一种看法；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比例，这使人对于投资于人的发展的意愿有一种看法。

在北美和东亚，公共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大大低于欧洲，这表明，欧洲依赖于由国家出钱的教育制度、保健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的程度非同寻常，这些大约占欧洲公共开支总额的60%。东亚国家的储蓄水平在全世界是最高的，而美国则是最低的。在第三个尺度上，北美和东亚最富有的一些国家比任何欧洲国家都更强调要确保使他们国家尽可能多的年青人接受高等教育，如果去衡量学生所达到的程度，而不是光看人数的话，数字会是接近的。北美的教育制度，且不管投入的资金有多少，所取得的结果的质量未必比欧洲或者东亚的高。在对像教育这样的服务性行业做对比时，重要的是考察产出的质量，而不是投入的数量。

本书后三章将对三大经济活动中心的出发点做比较详尽的评估，但是在这里大致描绘一番或许有助于说清楚每一个社会正在作出的不同选择。

北美所信奉的是，在社会事务上，公共开支的水平要保持比

按照惯例，“东亚”（有时是“亚洲太平洋”）经济通常包括四个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那就是日本、大韩民国、台湾和香港，以及六个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那就是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在内，但是本书把它包括在“东亚”之内。

<sup>②</sup>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经济学家衡量一个国家的商品和劳务的产出的常用尺度，本书全书使用这一概念。国民生产总值（GNP）偶尔使用。它包括从一国在国外的资产挣得的收入，不包括该国在有关国家的资产中对其它国家的支付。实际上，这两个尺度都很精确，同本章后面要讨论的问题都有关。

较低，让个人直接地或者通过保险来支付大部分钱。北美并不相信储蓄，而情愿把当前的收入中比较大的一部分花掉。北美虽然为接受教育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这种教育的产出的结果却一直是不佳的。

对比之下，欧洲则信奉国家进行高水平的干预：在西欧，在就分配资源做决定时，国家所占比重要比北美或者东亚工业化社会高得多。大多数欧洲国家相信储蓄，虽然并非全都如此。它们也都相信教育，虽然水准各不相同。

在东亚，形形色色的不同国家的政治背景五花八门，从民主制到独裁制，但是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却作出了类似的务实的决定。它们认为，国家在社会事务上所起的作用应当适度，它们坚定地实行储蓄，还致力于教育。

对这三个地区中每一个地区将在多大程度上达到繁荣作出评估，意味着对每一个地区的各个国家将如何来改变自行组织的方式作出猜测。所有发达国家并不需要完全相像。但是，我们完全知道是什么驱动经济增长，我们完全可以肯定，一个国家要取得杰出的经济成就，有些事情是必须做的。例如，美国将把它的储蓄提高到什么程度？欧洲国家将如何来改变它们的福利制度？大多数东亚国家在社会事务上的间接费用能够保持这么低吗？

各国是彼此学习的，如何治理国家的信息是普遍地可以得到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似乎一直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富有程度大体相当的国家的经济上的表现趋于相同，而富有程度不同的国家的经济上的表现趋于不同。换言之，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趋于彼此接近，而欠发达的穷国则发现，它们与富国之间的差距拉大了。只有少数国家——它们几乎全在东南亚——弥合了这一差距。

一批国家如何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成功地越过了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收入水平上的鸿沟？这种事情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难以对此作出回答。像新加坡的李光耀这样一位信奉权力主义的政治家会从自我约束和努力工作来解释这个地区的成功，而在日本，则往往把成功归因于这个国家文化和人种上的同一性。（这在美国造成严重的冒犯，因为根据这种说法，美国由于文化和种族上的多样性而必定会相对地衰落。）另一方面，经济理论则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个地区各国对教育的投资。<sup>①</sup> 不过，这些看法中没有一种看法在实际中有很大帮助，因为这些看法实际上并没有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为什么东亚能自我约束？为什么文化上的同一性有助于增长？如果果真如此，还有什么可疑的？如果教育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对教育的投资带来如此不同的结果？我们知道，发展迅猛的社会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在东南亚尤为醒目：诸如强调教育，储蓄率高和努力工作。<sup>②</sup> 但是我们很少明白，为什么这些社会形成了这些特点。

在对未来进行预测时，你得对现存的工业化国家所能获得的能力作出判断。过去 25 年来的一大教训是，“老的”工业化国家——北美和欧洲——常常痛苦地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从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中学习一些东西。下个世纪头 25 年的一大问题是，各国是否能彼此学习，不光是学习如何使它们的工业变得有效，而且学习如何使它们的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有效。

在 80 年代，对于增长的研究成了经济学中崭新的时髦的领域，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被看成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关键。世界银行 1993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牛津大学出版社于 1993 年 9 月替世界银行出版）论证说，教育和投资这两者在引发东亚国家的繁荣上起了重大作用。

<sup>②</sup> 世界银行一批专家在上面提到的《东亚的奇迹》这份报告对东亚增长的共同特点作了最出色的研究。

## 增长的重要性

如此强调效率不等于宣称效率或者提高了的效率所提供的增长，是唯一紧要的事情，这会是荒唐的。诚然，这里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如果经济增长提高人的福利（用《独立宣言》的话来说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则是“福利”），也必须顾及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考虑。肯定正确的一点是，增长所带来的财富为解决各种问题提供资金，许多其他问题的解决，包括环境问题的解决就可能变得容易得多，但是，正如前苏联集团的经济政策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一味追求增长有可能导致灾难：在这里，对经济数量目标的盲目追求导致极度的污染，人的寿命下降，腐败和苦难。自然，美国下层社会的出现表明，甚至十分富有的社会也可能发现，难以确保所有的人都分享国家的财富。然而，即便增长本身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缺乏增长则使问题的解决要难得多。

变得富有不光是改善生活水准的问题，不光是购买更多的耐用消费品，或者在教育和健康上花更多的钱。增长还是一种实力，因为它使世界的政治秩序发生变化。20世纪被人们认为是美国世纪，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把充当全球政治领导的任务强加于美国。事实上，美国经济相对规模的非凡的扩大以及它同样令人吃惊的缩小，反映了我国政治影响的上升以及随后的下降。1914年，美国约占工业化国家产出的34%；195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8%；1990年，这一比例回落到33%。本世纪之初，美国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是与德国、英国和法国等欧洲主要强国并列在一起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主宰了全球。现在，随着苏联的垮台，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强国和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但是，它对于欧洲联盟、日

本以及越来越多地还有对中国的优势已经缩小。到下个世纪之初，美国在世界产出中所占的比例将回落到本世纪初时所占的比例。它甚至不可能像它已保持了一个多世纪那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中国大概会超越美国。

80年代时，中国突然走上了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国的道路。中国领导人完全清楚，中国大陆之外的中国人名列世界上最成功的人之列：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华人发现了经济增长的秘诀，在增加财富和影响方面正在追赶日本。但是，在大陆，同样是中国人，却不成功。不光是经济增长陷于停顿，中国甚至有很大的困难来养活自己。这是极其丢脸的。正是这种民族失败感导致了有意识地作出决定，抛弃行不通的经济制度并转而在中国实行行得通的经济制度。1979年，邓小平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使中国摆脱了经济上的停滞不前，使中国成为80年代世界上增长最为迅猛的地区。

市场改革的推行是谨慎和部分的：政府开始时建立了市场经济有某些自由的经济特区，但是由此而引起的增长之猛到了80年代末变得明明白白的一点是，这种做法将逐步地推广到全中国。如果这一势头保持下去的话，到2003年，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sup>①</sup>如果中国80年代的增长率减半，它将在2014年超过美国。到2020年时，很难不把中国看成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大国，这种地位势必会使中国在世界政治中发生大得多的影响。

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看，较小的经济的地位的变化有可能更为剧烈。请比较一下阿根廷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的相对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阿根廷人跻身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民

<sup>①</sup> 见1993年时世界银行经济总顾问拉里·萨默斯的报告。详细内容见诸世界银行《国际经济观察》（1992年5月6月号合刊）

之列，人均收入仅次于美国。如果阿根廷相对的成就得以保持的话，它的经济的规模大体上相当于英国或者意大利，而从生活水准的角度来看，则会超过德国或者日本。而现在，阿根廷的经济规模大体上相当于挪威，为瑞士的十分之一，而阿根廷人现在甚至比匈牙利人还要穷。阿根廷的经验令人敬畏地提醒人们，一个坏政府具有多大的能量来破坏欣欣向荣的经济。<sup>①</sup>

另一方面，1900年时新加坡是英国的一个商港和军事中心，只有不多的22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摆脱日本的征服之后，它的人口仍然不足100万人。在英国统治下，50年代和60年代初，它的经济停滞不前，1970年，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950美元。它于1965年同马来西亚分开之后开始惊人地变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到199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2310美元，<sup>②</sup>为英国的3/4，它实现了充分就业，预算有结余，污染轻以及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社会问题相对少。到本世纪末，新加坡可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超过英国。

阿根廷花了75年时间从世界人均财富排名榜上的第2名降到了第50名，而新加坡则花了一代人的时间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到发达世界的地位。各国以不同的速度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发生巨大的变化。

## 增长是如何发生的？

如果各国都能较好地理解高速增长的道路，它们都会走上这

见《美国统计摘要，19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88年的资料，引自《有关世界重大统计的经济学家手册》（哈钦森出版社，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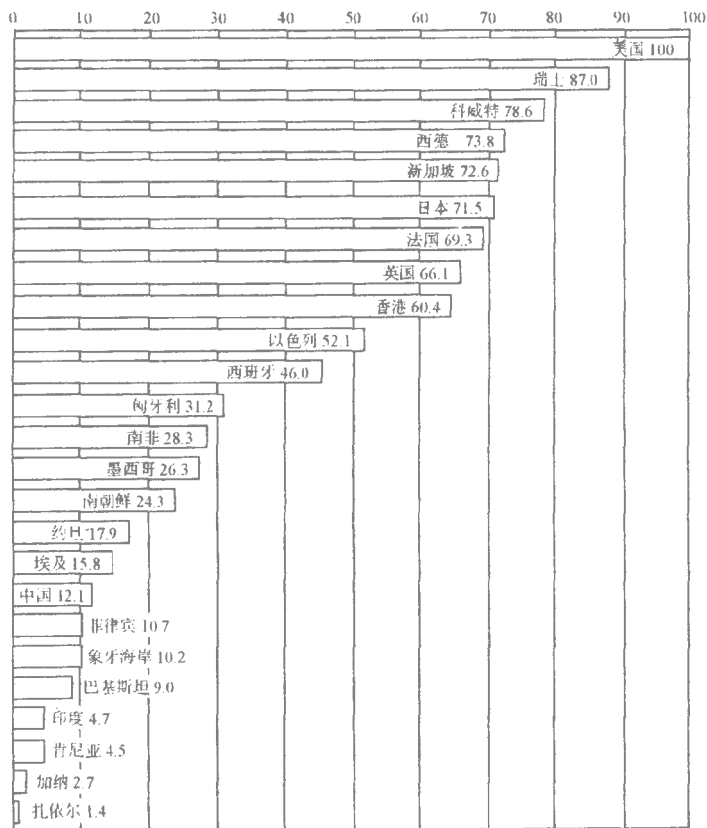
<sup>②</sup> 见新加坡工商部统计司。

条路。可是，对增长作出解释，是经济学家们只掌握极其局部的回答的许多问题之一。

首先，我们所知道的是，经济的增长在不同的国家里是由不同的事情所驱动的。让我们看一看一些例子：工业化之前的法国和城邦威尼斯以及当代的香港和新西兰。在工业革命之前，财富主要来源于土地，或者来源于贸易。1500年，从人均收入来看，法国大体上比英国富出一倍，主要由于它有出产较多的农业用地，但是根本没有任何土地的威尼斯比法国还富，它的财富来自手工业和贸易。相似的是，新西兰和香港1991年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体相同，但它们的以不同方式生产出财富的。新西兰的资产是有大量土地和人口很少，因此新西兰是一个低成本的农产品生产国，它的出口产品中将近20%来自初级产品（例如木材、矿石），加上肉类、奶制品、鱼、水果、蔬菜和饮料，比例上升到将近70%。另一方面，香港土地很少，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因此，它从事制造业和转口贸易，它的出口产品中90%左右是制成品。新西兰像16世纪时的法国，香港像16世纪时的威尼斯。

甚至在欧洲范围内，具有明显相似文化遗产和相近生活水准的国家也是以十分不同的方式争取到它们的生活水准的。德国最大的出口收入来自制成品，法国的最大收入则来自旅游业；挪威33%的出口收入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瑞典这方面实际上毫无所得；1991年，苏格兰仅出口苏格兰威士忌酒就获得18亿英镑，而爱尔兰的整个饮料的出口，包括威士忌酒、吉尼斯黑啤酒、比米希酒、瓶装水等等，总共只有1.45亿英镑。类似的国家在不同事情上都是如此。

富国和穷国：以购买力平均计算的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在工业革命中，第一个工业国英国给当时的生产财富的来源加上了大规模生产，向全世界显示了工厂制的力量。英国的榜样为仍然是主要工业化世界的欧洲大陆、北美和日本所仿效和加以发展。走向富裕之路似乎在于尽可能快地实现工业化；事实上，

① 见《有关世界重大统计的经济学家手册》（哈钦森出版社，1990年，1988年数字）

这种做法常常导致灾难。苏联和东欧的强行工业化，中国的大跃进，许多欠发达国家匆匆忙忙建立起工业，并没有导致靠自力维持的经济增长，而是事实上使人民蒙受苦难，给环境造成巨大损害。一个国家行得通的办法未必到处都行得通。

我们知道的第二件事是，增长的原动力随着时间的消逝是不断变化的，技术的发展首先是提高农业的生产率，然后是提高制造业的生产率，最后是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随着各国的发展，它们的经济结构势必发生变化：农业在它们的产出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而工业则增加其比例；而过一段时间以后，工业又开始缩小比例，并为各种各样的服务业所替代。典型的是，在所谓的“工业化”国家中，亦即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中，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到 70%。

目前存在一种难以理解的似是而非的情况。所有工业化国家正在越来越少地实行工业化，那些以最慢的速度这么做的国家比那些以较快的速度实行非工业化的国家来得成功。<sup>①</sup> 一些数字表明了这一点。非工业化的进程在美国走得最远，到 80 年代末，美国的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只占 29.2%；在英国，这一比例为 30%，在法国为 28.7%。但是，在德国和日本，非工业化进行得比较迟缓，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 38.7% 和 41.8%。<sup>②</sup> 因此，德国和日本一般被认为比较成功，这是指在整个 80 年代（一直到德国统一）它们在国际收支上有大量结余，这两个国家一直是这样的。

然而，尽管英国和美国有一种看法认为，未能防止工业部门

关于制造业以“老的”工业化国家转向“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关于“老的”工业化国家中服务业增长的杰出研究报告是理查德·布朗和德安妮·朱利叶斯所撰写的《制造业在世界新秩序中是否仍然具有特殊意义？》，该研究报告于 1993 年曾获得（艾梅克斯银行评论）奖。

<sup>②</sup>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计算，其中：美国是 1987 年的数字，英国是 1988 年的数字，德国和日本是 1990 年的数字，法国是 1991 年的数字。

的衰败，乃是公共政策的失败，是教育、金融服务业、文化和政府的失败。实际回答可能是，虽然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可能允许从工业过快地转向服务业，这使它们产生国际收支问题（因为服务业不能像商品那样在国际上交易），但是从战略上说，这些国家的处境较好，将从今后的经济增长中获益。因此，德国和日本由于谋求保留它们的工业，而面临重大的结构问题，至少在今后 10 年内有可能使它们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

成熟的工业化国家之所以无法保留制造业的优势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上的发展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率，同时也加速了越过国家边界流传的速度。技术转让的机制因工业不同而不同。例如，在电子行业，或许就是复制一种新产品而已，可能仅仅需要两个月时间。因此，美国或者日本开发的一项产品，几周以内就在韩国或者台湾制造出来了：证据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个人电脑的“复制品”的产量的增加，而大多数“复制品”是台湾制造的。然而，多国公司越来越多地越过国界从事购买和生产。日本汽车生产从日本转向美国和欧洲（特别是英国），既迫使世界上其他汽车生产厂商仿效日本的技术，也使它们能够这么做，而重要的还使它们仿效日本的管理技术。

随着制造业技术越来越自由地超越边界，任何一个国家仅仅由于制造出东西而获得压倒别国的竞争性优势是越来越难了。相反，相对的优势将来自设计和销售，来自商标和经销。尽管事实上到处都在制造商品，从设计和销售仍然是制造的意义上说，这方面做到出色的国家仍将继续繁荣；但是，它们的优势将来将比过去为小。越是能持久地获得对竞争对手的优势的国家，将从制造比较难以仿造的产品上取胜。

这种产品或许根本就不是商品；它们可能是劳务。对于下一代人来说，真正耐人寻味的一个问题是，提供劳务而不是生产商品方面的竞争性是否会继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动力。到目前